

FA ZHAN CAI SHI YING DAO LI

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发展理论解读

刘国华 著



湖南人

邓小平发展理论解读

发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才是硬道理

责任编辑：李蔚然
装帧设计：丁 红

发展才是硬道理

刘国华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长沙理工大印刷厂印刷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6,000

ISBN 7-5438-3754-4

D·602 定价：28.00元

引言

世纪伟人邓小平，一生贯穿整个20世纪，犹如一部壮丽辉煌的史诗，一部高亢激越的乐章，他的丰功伟绩、科学理论、革命风格，他所擘画的跨世纪宏伟蓝图，将永远激励、鼓舞和引导我们在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前程的事业中勇往直前。

一位举世瞩目的世纪伟人

邓小平，这个从四川的丛山峻岭中走出来的少年，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世纪伟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世人有目共睹。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邓小平：他是“20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是“开创历史的伟人”，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些评价毫不夸张。

邓小平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充满传奇色彩。从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巴蜀少年，到一个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一个开疆辟土的开国元勋，到“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党政军领导人，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继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三落三起，波澜壮阔。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勇猛果敢的胆识、卓尔不凡的人格力量，世之罕见。他开辟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光明前景。虽然我们不搞中国革命输出，也不搞中国建设模式输出，但是，“民族性即是世界性”。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会从他们的实际出发，从中受到借鉴和启发。

风云激荡的20世纪已经过去，震撼人心的百年历史长卷已经展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世纪伟人邓小平走过了一个世纪，开创了一个时代。他的风雨人生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映射出中华民族富强文明的发展过程。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反思与继承，重温这部厚重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开拓与创造未来。

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着21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在改革开放中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和诸多“左”的错误观点，以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迷茫和困惑，归根到底就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念，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搞霸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搞战争与革命输出、干涉别国内政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了一个完整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发展的核心是发展经济

民富国强是多少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心愿，更是邓小平一生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语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指明了抓紧时机发展经济的极端重要性。

发展，当然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最根本的是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发展国民经济是大局，全党全国人民都要讲这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是迎接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挑战的需要。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它们的发展，构成了对我国的挑战。因此，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必须是“波浪式”的快速发展。所谓“波浪式”快速发展，是指经济水平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1984年到1988年的5年间，我国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认为，从一些国家发展的经验看，把经济发展速度搞快一些是完全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据此，邓小平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国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条件，国际形势也十分有利，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认为，把经济发展速度搞快一些，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指出：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呀！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希望进一步制定落实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在国外学成的科技人员回国工作，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为我国的科技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要发展，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改革开放，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离不开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支持和配合。围绕发展经济这个核心，邓小平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科学发展理论。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准确理解、科学把握、深入发展邓小平理论，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国华

2003年10月

目 录

引言

全面整顿 勇于发展	(1)
临危受命, 接过“四化”的接力棒	(2)
发展国民经济, 还是安定团结好	(5)
整顿铁路, 找准国民经济建设整顿的突破口	(10)
以“铁”促“钢”, 全面整顿的浪潮开始形成	(15)
解决“肿”、“散”、“骄”、“奢”、“惰”, 巩固钢铁长城	(20)
各方面都要整顿	(23)
全党讲大局,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7)

走出困惑 面向发展	(32)
历史在徘徊中前进	(33)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36)
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39)
所有冤假错案, 人民不满意的事, 一起解决	(46)
东北之行, “到处点火”	(49)
转移工作重点, 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已成燎原之势	(52)
开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宣言书	(55)
新时期的伟大开端	(60)

科学决策 定位发展	(64)
一言兴邦：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65)
确立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9)
运筹帷幄，构建“三步走”发展战略	(76)
脚踏实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81)
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84)
农村改革 引导发展	(86)
大胆吃螃蟹，第一个农村责任制文件的诞生	(87)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提法：承包到作业组	(91)
尊重农民的首创权：“包产到户”普遍推广	(97)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促进社会化生产	(101)
意外的收获：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06)
政治改革 确保发展	(112)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112)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122)
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	(125)
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培养接班人	(130)
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141)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45)
依靠科教 高效发展	(160)
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160)
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66)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73)
把人口众多的劣势变成人才优势	(179)
发展高科技，抢占制高点	(181)

“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	(187)
市场经济 深入发展	(190)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2)
出台“中国版政治经济学”	(196)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2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	(206)
对外开放 带动发展	(214)
走出封闭——对外开放政策的确定	(214)
“杀出一条血路来”——经济特区的创立	(221)
惊涛拍岸——沿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	(229)
巨龙腾飞——全方位、大开放格局的形成	(235)
一国两制 共谋发展	(244)
依据实际情况，产生科学构想	(245)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249)
归帆踏浪来，香港顺利回归	(259)
和平外交 促进发展	(264)
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264)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268)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271)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74)
注重安全，谋求发展	(277)
坚持和平共处，建立国际新秩序	(281)



裁军百万 专注发展	(285)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285)
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新目标的确立	(287)
百万大裁军——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291)
高、精、尖——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	(302)
由“消费型经济”向“增殖型经济”转变	(304)
 抓住时机 快速发展	(307)
快速发展的动因——挑战与机遇	(308)
快速发展的基石——科学技术	(313)
快速发展的动力——改革	(315)
快速发展的手段——市场经济	(317)
快速发展的形式——波浪式前进	(320)
 加强党建 不断发展	(323)
聚精会神抓党建	(324)
中央要有权威	(326)
坚持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领导	(328)
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	(332)
不负重托，聚精会神地做几件让人民满意的事	(336)
两代“核心”顺利交接，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发展	(341)
南方谈话，掀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高潮	(349)
 后 记	(355)

全面整顿 勇于发展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深重的社会危机为前提的。

“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都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当然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有关，同时，也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特殊经历有关，特别是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时，开展全面整顿的历史性亮相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

临危受命，接过“四化”的接力棒

1966年8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卓琳夫妇被送到江西省新建拖拉机厂，开始了监督劳动的生涯。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反党集团自我暴露与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全国范围内，群众的“革命”狂热急剧下降，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与日俱增。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1972年1月10日，他穿着睡衣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陈毅是个好同志，并再次提出要为“二月逆流”平反。他还说，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实际上就是发出了启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的信号。一个新的契机出现在已被打倒的邓小平面前。在场的周恩来随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1972年的秋天，在江西劳动的王震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早日起用邓小平。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并作了一些自我分析。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二、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

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当机立断，于毛泽东作出指示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指示的全部内容，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活动，让他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解放”邓小平做了准备。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了离开三年多的北京。

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工作。

1973年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扬邓小平：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4月10日，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复出的邓小平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代表，身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

邓小平气宇轩昂，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全世界受到普遍关注。

1974年10月，面对利用“风庆轮”事件无理挑衅的“四人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在原则问题上的钢铁般性格。

1974年12月，毛泽东指出：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并作出了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决断。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短短的半个月里，邓小平被赋予党、政、军的重任，显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亲自扶起，委以重任，不能不被看作是戏剧性的事件。但这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毛泽东需要一个具有治国安邦之才的人协助他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经面临绝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也需要一个新的舵手重新调整航向，重新驶向胜利的彼岸。虽然毛泽东的本意是希望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整顿局面，而现代化建设要想调转航向，就必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二者显然相悖。但在稳定局面、发展生产的历史交叉点上，邓小平成了最适合的人选。在当时党和国家资深的领导人中间，邓小平不但身体强健，精力充沛，头脑敏锐，而且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一向以“按辩证法办事”而著称，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邓小平是“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堪当安邦兴国之重任。

四届人大的召开为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由于周恩来病重，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就主要落到了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届人大重申实现“四化”的宏图，指出了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反映了饱受动乱之苦的人民群众盼望国家富强、生活安定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后来，人们得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鼓舞人心的那个政府工作报告，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

目标是明确的。可惜，作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周恩来，却因病魔的折磨无法亲自领导向这个宏伟目标的进军之旅了。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几乎是瓦砾一片，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正虎视眈眈，纠集力量准备反扑，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周恩来急需一位强有力的助手，把握国务院这块阵地，继续推动全国形势的稳定发展。这个人要有卓越的能力并熟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要有权威，能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所接受；另外还要有胆识，敢于和江青等人斗一斗，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周恩来选中了邓小平。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顶着江青等人的敌视和“左”倾势力的压力，开始全面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期党、政、军的各项工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发展国民经济，还是安定团结好

说邓小平出任于临危之际，受命于危难之时，是恰如其分



的。由于毛泽东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等人继续进行干扰和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严重滑坡。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长期存在的派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泛滥，一些地区甚至发生抢夺枪支、组织民兵武斗的严重事件。“四人帮”及其党羽插手的地区，派性、武斗等问题更加严重。我国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局势依然十分严峻。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首先必须消除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很显然，要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加以整顿，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情况极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在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形势，紧紧抓住了派性严重、社会动荡和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混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两个主要问题，提出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派性是“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产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别组织遍布全国，派别活动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些地区甚至是派别专政。搞派性活动的人，用派别利益来取代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制造事端，破坏团结，不顾大局，我行我素。而“四人帮”又正是利用一些人的派性意识，结党营私，以售其奸。派别活动普遍频繁，成为社会动乱的主要表现之一，又是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闹派性已经严重影响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局，成为了全面整顿工作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对此，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